

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第四辑）

XinXi SheHui Zhong De
GongGong TuShuGuan

信息社会中的 公共图书馆

于良芝 著

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第四辑)

信息社会中的公共图书馆

Public librarie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于良芝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信息社会中的公共图书馆/于良芝著.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12

(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吴慰慈,陈源蒸主编.第4辑)

ISBN 978-7-5013-5675-1

I. ①信… II. ①于… III. ①公共图书馆—
图书馆服务—研究 IV. ①G25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13686 号

书 名 信息社会中的公共图书馆
著 者 于良芝 著
责任编辑 高 爽 王炳乾

出 版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
(原书目文献出版社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发 行 010-66114536 66126153 66151313 66175620
66121706(传真),66126156(门市部)

E-mail nlcpress@nlc.cn(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 →投稿中心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装 北京玥实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印 张 14.75

字 数 196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13-5675-1

定 价 70.00元

《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编委会

- 主编:吴慰慈 陈源蒸
- 编委:陈源蒸 中宣部出版局研究馆员
郭又陵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原社长
李万健 中国图书馆学报编审
李致忠 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博士生导师
倪波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彭斐章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谭祥金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教授
吴慰慈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徐引篪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序

2011年春天,《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编委会的陈源蒸老师致电正在苏州开会的于良芝(我们当时正一起参加文化部的公共图书馆教材编写会议),希望她把自己的论文编成文集,纳入该文库第4辑。放下电话,良芝对我说,尽管她没有立刻谢绝陈老师,但她基本上可以肯定,自己不会接受邀请。良芝之所以对出版文集缺乏兴趣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从2000年回国算起,她从事研究和写作的时间比同龄学者短得多,她的绝大部分论文发表于2005年以后,任何一篇都可以在CNKI数据库里轻易查到。出版文集对读者来说,不会产生任何附加值。良芝说她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服自己去做一件对读者毫无意义的事情。第二,由于写作时间短,她认为自己的论文无论如何也凑不成一部文集。她说凭自己这点积累就匆忙出文集,会贻笑大方的。

这是我听到的有关这部文集的最初消息。一个多月后,良芝发来邮件,问我能否为她的文集《信息社会中的公共图书馆》写一篇序,说是编委会要求的。我猜测,她是遇到了一个比她还执着的编委会。尽管出文集并非良芝所愿,但我还是欣然答应作序。

《信息社会中的公共图书馆》收录了良芝2000年回国以后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发表的有关信息分化和公共图书馆的中文论文13篇。虽然良芝始终认为,这部文集不会比原始论文带给读者更大的价值,但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所收论文经过编辑,还是取得了一些“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这个效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突出了良

芝的主要研究兴趣,即信息分化问题及公共图书馆问题;二是在一定程度上诠释了她对图书馆学与情报学(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的理解。良芝在为《图书情报工作》撰写的专家视点中指出,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的使命在于解决人类两大信息问题,即信息的有效查询和有效获取。围绕这两大使命,产生了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的核心内容:(1)关于信息组织整理的哲学(主要是认识论)、理论和技术;(2)关于信息传递传播的哲学(主要是伦理学)、理论与方法。前者主要解决信息的有效查询,后者主要解决信息的有效获取^①。在最近的一篇会议征文中,良芝又把图书馆情报学研究活动分为知识创新研究和实践支持研究。前者致力于推进上述两大研究内容的知识前沿,后者致力于解决信息查询与获取的实际问题。良芝认为,由于图书馆情报学知识体系具有世界性,因此,推进知识前沿的研究具有内在的国际化取向;实际问题的解决则必须考虑社会和文化环境(即国情),因此支持实践的研究具有内在的本土化取向^②。对于自己的研究兴趣在图书馆情报学核心内容中的位置,良芝曾明确地把它归于第二领域——信息传递传播(信息有效获取)。这部文集收录的13篇论文显然证实了这一归类。对于其研究兴趣在“知识创新——实践支持”和“国际化——本土化”中的位置,良芝从未做过自我定位,但这13篇论文足以帮助我们完成这一定位:与信息分化相关的论文基本属于知识创新性质和国际化取向,而与公共图书馆相关的论文大部分属于实践支持性质和本土化取向。

在完成对良芝研究兴趣的归类 and 定位后,我们不难发现,她的研究兴趣之间并非毫无关联:她从事的知识创新研究为实践支持

① 于良芝. 图书馆与情报学的使命与视域. 图书情报工作, 2009(9): 5-10

② 于良芝. 图书馆情报学研究的知识创新与实践参与——兼论我国图书馆情报学研究的国际化与本土化. 第六次全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讨会征文

研究提供了明显的观照。那些认为良芝的公共图书馆研究颇有“味道”的读者,或许在读完这部文集之后,就能知道这“味道”的来源了。果真如此,良芝也不必为做了“一件对读者毫无意义的事情”而不安了。

李超平

浙江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系

目 录

理解信息资源的贫富分化:国外“信息分化”与“数字鸿沟”	
研究综述	(1)
结构与主体能动性:信息不平等研究的理论分野及	
整体性研究的必要	(29)
整体性社会理论及其对信息不平等研究的适用性	
——以布迪厄的社会理论为例	(57)
从信息政治经济学视角看公共图书馆发展的社会环境	(73)
探索公共图书馆的使命:英美历程借鉴	(84)
公共图书馆存在的理由:来自图书馆使命的注解	(101)
公共图书馆的使命与服务:基于内容分析法的国内外	
比较研究	(122)
培养阅读兴趣与支持正规教育	(140)
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意义建构与认识盲点	
——对公共图书馆评估总结材料的话语分析	(143)
走进普遍均等服务时代:近年来我国公共图书馆	
服务体系构建研究	(161)
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	(184)
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建设的法律保障:法定建设主体及相关问题	
.....	(189)
我国基层图书馆的专业化改造	
——从全覆盖到可持续的战略转向	(208)
主要著作目录	(220)

理解信息资源的贫富分化： 国外“信息分化”与“数字鸿沟” 研究综述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信息成为重要的经济资源,信息资源的分化问题也开始作为重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1],受到广泛关注。最初的研究主要来自图书馆与情报学、大众传播等领域,研究焦点为社会成员在信息获取和利用能力方面的差距(“信息分化”)。1975年的一份文献调研显示,截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已有700多篇文献专门关注信息分化和贫困问题^[2]。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互联网成为信息贫富的主要分水岭,互联网享用机会差距(即“数字鸿沟”)也随之成为信息资源分化问题的新焦点。截至20世纪末,有关数字鸿沟的讨论已经在学术界、大众媒体和世界政治经济论坛产生了数以万计的文献^[3],其研究者横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信息与通信技术、图书馆与情报学和大众传播等广阔领域。

本文旨在总结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英文学术文献对上述两个焦点的研究进展,展现这两个领域的内容和话语特点以及它们在未来研究中相互继承的必要性,为我国正在进行的相关讨论和政策制定提供启迪。本研究确认的相关文献主要是根据ISI和OCLC的文摘型数据库检索的研究型论文(research papers)、主要观点型论文(opinion papers)以及被学术刊物评论的相关图书和研究报告。

1 理解信息分化与信息贫困

1.1 定义信息分化与信息贫困

在学术文献、大众传媒及政府出版物中,用来描述“信息分化”与“信息贫困”现象的术语有很多,前者如“信息分化”(information gap 或 information divide 或 information disparity)、“信息不平等”(information inequality 或 information inequity)、“信息穷人与信息富人的差距”(information rich vs. information poor 或 information haves vs. information have-nots)、知识差距(knowledge gap);后者如“信息贫困”(information poverty)、知识贫困(Knowledge poverty)、“信息穷人”(information poor)、“无信息者”(information have-nots)。

对于以上术语,早期研究主要采用归类式定义,即将社会中的贫弱人群,如低收入者、老人、少数民族、单亲父母、残疾人等归为“信息穷人”;将这些人群与主流社会的信息差距笼统地称为“信息分化”^[4]。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不少文献开始赋予“信息分化”和“信息贫困”更精确的释义。例如,美国学者 Sweetland^[5]将“信息贫困”定义为以下形式的信息匮乏:缺少信息获取(lack of information access)、信息超载(overload)、信息偏见(self-imposed poverty);荷兰学者 Van Dijk 将“信息分化”定义为社会成员在信息占有和使用方面的差距,其中的“占有”和“使用”差距均指连续区间上的程度区分,而不是“有”“无”构成的两极区分^[6-7];南非学者 Britz 提出,“信息分化”除了表现为信息量和信息设施的差距,还表现为以下能力差距:信息检索能力、信息意义汲取能力、信息价值评估能力^[8-9]。

除了多角度、多层次地理解“信息分化”与“信息贫困”概念,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研究还特别注意“信息分化”“信息贫困”与其他相关概念的区分。这些区分强调:第一,经济上的富有/贫困与信息的富有/贫困不能完全等同,信息富有者不仅需要具备获取信息资源的经

济实力,还必须具备信息检索能力、信息价值评估能力以及信息意义汲取能力等智力资本^[10],在很多情况下,他们还需具备接近权力中心的政治资本^[11-12];第二,信息富有及贫困与信息拥有量的多寡不能等同,过多的信息(信息超载)也会干扰人们对重要信息的关注,降低人们的信息处理能力,导致有用信息的匮乏^[13-14];第三,由于存在不同种类的信息,特定人群可能会同时在一类信息上匮乏而在另一类信息上富有,例如,发展中国家虽然缺乏技术信息,却富有文化信息和自然信息,忽略他们在后者上的富有如同忽视他们在前者上的匮乏一样,都会阻碍他们对信息的有效利用^[15-16]。

1.2 解读信息分化与贫困的性质

20世纪70年代以后,对信息分化和贫困现象的解读逐渐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视角:信息政治经济学视角、社会学视角和认知学视角。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相关研究大都沿用这三种视角。

信息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of information)是一种运用政治经济学概念和方法分析信息生产、交换、使用过程中的社会关系的视角,它展现的是受已有社会关系决定的等级化信息世界。在这里,社会结构中的强势集团不仅拥有获取信息资源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他们控制着大部分信息生产和交换过程、操纵着国家甚至全球信息政策的制定,能够根据自身利益决定信息资源的分配模式。因此,在信息政治经济学视角中,信息分化实质上是阶级分化、南北分化的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学者 Herbert Schiller、Dan Schiller、Birdsall,英国学者 Golding、Murdock、Haywood 和 Webster 就是从这一视角解读国家之间和社会阶层之间的信息不平等现象的^[17-25]。

社会学视角是一种聚焦族群文化对信息行为的影响的视角,它展现的是打着族群文化烙印的“小型信息世界”(small worlds)。在这里,具有不同文化习惯和价值观的人以不同方式、从不同渠道获取信息,又以不同方式评价和利用信息。因此,在社会学视角看来,尽管阶级

结构对信息资源分布的影响毋庸置疑,但信息分化主要是族群文化差异的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以来,Chatman及其同事对贫弱人群信息行为的研究、Hersberger对无家可归者信息需求的研究、Sligo对新西兰移民卫生信息需求的研究、Spink及同事对黑人社区信息行为的研究等,都是从这一角度解读信息分化现象的^[26-30]。

认知学视角是一种聚焦个体在信息处理中的认知特点的视角,它展示的是与个体的认知能力密切相关的信息行为世界。在这里,当信息传播增加的时候,人口中处于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比较低地位的人能更快地吸收信息^[31];在接受同样信息的时候,教育水平高的人比教育水平低的人能记住并反馈更多的信息^[32]。因此,在认知学视角中,信息分化主要表现为信息吸收能力的差距。20世纪90年代以来,Agada、Gaziano、Grabe等人对知识差距和信息分化的考察就是这类研究的代表^[33-35]。

1.3 剖析信息分化与贫困的原因

与上述三种解读视角相适应,现有研究对信息分化与贫困原因的剖析也在三个不同层面上展开:宏观层面、中观层面及微观层面。宏观层面的考察主要是通过信息政治经济学视角实施的。这种视角关注社会的结构因素、经济制度、政治权势、集团利益等因素对信息分化与贫困的影响,认为在信息成为重要资源的背景下,已有的南北差距和阶级差距、私营部门对信息资源的控制以及按市场规则构建的信息交换机制,是导致信息分化与贫困的根源。例如,Herbert Schiller^[36]和 Dan Schiller^[37]通过对美国社会信息分化现象的研究发现,二战以来,美国私营部门在信息领域的扩张、跨国媒体公司对信息传播渠道的垄断、保守政治力量向私营部门的利益倾斜、保守的学术机构为私营部门提供的理论与舆论支持等,都是导致和加剧美国社会信息不平等的原因。这些因素作用的结果是,一方面,根据私营部门利益制定的游戏规则日益统治信息市场;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信息需要通过市场渠道才能获得,令贫弱阶层望尘莫

及。Golding、Murdock 和 Webster 等对英国社会信息分化现象的剖析揭示了相似的政治经济原因^[38-40]。

信息政治经济学研究还表明,政治经济力量的不平衡是造成国家之间信息分化的原因。Haywood、Feather、Meadows、Arunachalam、Persaud、Gettelman 在考察全球科研信息保障能力时指出,发达国家不仅是科研信息的主要生产国,他们也是对信息进行增值性处理的主要加工国(如对原始文献进行加工生成全文或二次文献数据库,或对原始的统计资料进行加工生成便于查询的事实性数据库),发展中国家若要获取这些信息,就必须利用他们稀有的外汇资源、通过全球信息市场、按照昂贵的信息商品价格、履行严格的知识产权协议,从发达国家购买^[41-46]。Haywood 进一步指出,在其他国际交往中,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优势也经常转化成信息优势,例如,他们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的时候,几乎总是附带诸如开放电信市场、引入竞争机制、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减少公共开支等条件,而这些条件又几乎总是进一步削弱发展中国家的信息生产和利用能力^[47]。

对信息分化与贫困原因的中观考察主要是通过社会学视角实施的。这一视角把特定的社区和人群看作相对独立的“小世界”,这些“小世界”具有独特的文化特征和社会规范,甚至具有独特的语言和风俗习惯,这些特征影响着社区成员对信息需求的感知、对信息渠道的选择以及对信息价值的判断,从而决定着他们在信息分化中的位置。文化差异还导致弱势人群的“小世界”与外部世界之间经常存在信息交流“屏障”:小世界内的人很少自觉地从外部世界寻求信息,而外部世界的信息,由于它们从内容到形式都打着主流文化的烙印,也很难真正注入小世界的生活。即使主流信息以某种方式强行注入(如通过社会救济机构或社会工作者),也经常被视为无用信息,形成信息超载。这种“屏障”的存在是导致弱势“小世界”信息贫困的主要原因。

导致信息分化与贫困的社会文化原因在 Chatman、Spink、Hersberger、Jeager and Thompson 的研究中表现得最为显著^[48-51]。Chatman

的“小世界”由单身母亲、老人、失业者和其他依赖社会救济的人群构成,她发现,“小世界”与外部世界的信息交流基本符合“局内人”与“局外人”之间的信息交流特征:规避风险、对个人信息保密、传递虚假信息(实施欺骗)、依据情景相关性(situational relevance)判断信息价值。Spink 考察的“小世界”是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个黑人社区,她发现,社区成员的信息渠道主要是家庭成员和邻居;除卫生保健及工作信息外,他们很少从外界获取信息。Hersberger 的“小世界”是一组蛰居临时住所的无家可归者。与 Chatman 和 Spink 的“小世界”不同的是,这里的居民通常具有明确的信息需求(如工作信息和长久住所信息),而且经常收到临时住所管理人员、社会工作者和其他服务机构提供的信息,他们并不感到信息量的匮乏,但有时感到信息超载。

对信息分化与贫困原因的微观考察主要是通过认知学视角实施的。与前两种视角相比,认知学视角更加关注个人在信息处理中的认知差异。相关研究^[52-55]显示,个人兴趣、交流技能、对媒介的好恶、参与社区事务的程度、人际交往等都是影响信息分化的因素。信息贫困人群的特征在于他们缺少信息意识,缺乏获取信息的动机和提取相关信息的能力。

以上三种研究互为补充,共同揭示了一个被重重障碍包围的信息贫困世界。信息资源向信息贫困世界的流动受到政治经济因素、社会文化因素及个人因素的层层阻碍,致使信息贫困世界获得的有用信息远远少于外部世界的信息,并由此形成社会的信息分化,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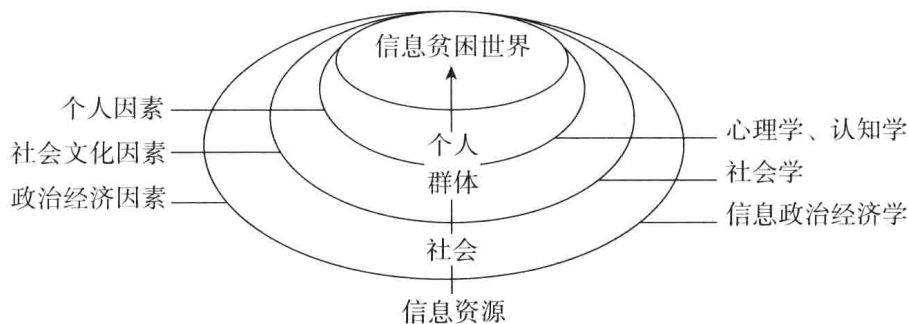


图 1 信息贫困及其研究视角

1.4 消除信息分化与贫困的政策性建议

理解信息分化与贫困的最终目标是消除信息贫困,实现信息平等。为此,相关研究都十分关注其结果的政策启示。几乎所有的研究都认为,消除信息贫困与分化的根本途径,不在于简单地增加信息资源或改善信息基础设施,而在于解决导致信息贫困与分化的深层原因。在信息政治经济学视角看来,这意味着废除导致社会不平等的制度因素,停止将信息纳入市场经济体系,恢复知识的公共品性质,增加对教育事业和公共信息机构(如图书馆)的投入,鼓励学术文献的开放存取,保护发展中国家的传统知识与文化遗产等^[56-58]。在社会学视角看来,解决信息贫困与分化问题的关键是改造面向贫弱群体的信息渠道和基于中产阶级文化的信息包装(如新闻报道),在弱势社区和主流社会之间设置合适的信息中介,鼓励社区成员外出学习和回归社区等^[59-60]。在认知学视角看来,解决信息贫困与分化的关键是提高全民信息素养,增强社会成员检索、吸收和利用信息的能力^[61]。

2 理解数字鸿沟

2.1 定义数字鸿沟

根据相关文献^[62]的追踪,“数字鸿沟”一词是由美国 Markle 基金会总裁 Lloyd Morrisett 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提出的。Morrisett 使用这一术语来表达人们在信息与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以下简称 ICT)享用机会上的差距。由于 ICT 的核心是互联网技术,一些文献也直接用“数字鸿沟”表达互联网享用机会差距:在鸿沟的一边是在家里或工作中有互联网可用的社会成员,而在另一边是无互联网可用的社会成员。近年来,随着网络用户的迅速增加,如此理解的“数字鸿沟”内涵似乎已不足以揭示这个概念欲以反映的社会分化现实,它需要更科学、严谨的定义。

很多学者^[63-71]强调应该从 ICT 的“享用机会”和“有效利用”两个方面界定数字鸿沟,但无论是享用机会差距还是有效利用差距,都不仅仅是单一因素(如网线)的“有无”区分,而是多个因素的程度区分,例如,“享用机会”的区分包括是否联网及网络连接方式、硬件性能、可享用信息的质和量等的差距^[72-73];“有效利用”的区分包括信息技能(skills——利用互联网快速有效地找到相关信息的能力)、信息素养(literacy——评价信息和吸收信息的能力)、数字心智(mental access——利用数字化设备的经验或对 ICT 感到自如的程度)、利用方式和范围(如收发邮件、获取信息、游戏娱乐)等方面的差距^[74-78]。

除了赋予“数字鸿沟”更丰富的内涵,近年的研究还试图对“数字鸿沟”进行确切的量化定义。Corrocher、Ordanini 提出的量化定义就是这种研究的代表。Corrocher 和 Ordanini 首先在吸收美国商务部、OECD 等机构所采用的统计指标以及社会信息化指标的基础上,确定了测度社会数字化程度的基础指标(elementary indicators),然后通过因子分析对这些指标进行了归类,得出了测度数字化程度的六类因子,又通过加权法将六类因子归纳为一个综合指数。该指数在不同国家的分布情况就反映了这些国家的数字鸿沟^[79]。

数字鸿沟可能存在于各类人群之间。Norris 归纳出三种主要的数字鸿沟:①全球性鸿沟,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②社会鸿沟,即一个国家内部不同人群(如阶层或地区)之间的差距;③民主鸿沟,即不同政治力量对虚拟信息空间的非均衡占有^[80]。

2.2 解读数字鸿沟的性质

在当代社会,数字鸿沟究竟代表了什么性质的人际不平等?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关系到其他一系列问题的答案:它是否需要消除或弥合?社会应该为其弥合付出多少资源和努力?这种资源来自哪里——政府、企业还是先期消费的公众?由于这些问题涉及不同集团的利益,因而,对数字鸿沟性质的解读不可避免地渗透着政治立场的

分歧。已有文献主要存在四种不同解读,分别体现着四种不同程度的右派或左派政治主张。

第一种观点(本文称之为数字鸿沟问题上的极右观点)认为,人们对 ICT 的享用确实存在一定差距,但是,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差距,如卫生差距、工作条件差距、衣食住行差距等;任何新技术都不可能同时被所有人采用,都需要经历“有者”和“无者”并存的时刻。这是自然形成的社会现实,并不具有特别的伦理、政治和经济意义。这种观点还认为,差距的消失也将是一个自然过程,因为在正常的市场条件下,ICT 企业必然在利润驱使下,不断寻求降低成本和扩大市场的途径,从而降低 ICT 价格,使越来越多的人成为 ICT 拥有者,这个过程事实上就是技术的早期采用者资助后来采用者的过程^[81-84]。

第二种观点(本文称之为数字鸿沟问题上的右派观点)认为,数字鸿沟是当代社会的客观现实。它的存在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严峻的发展问题。在这种观点看来,数字鸿沟锁住了相当规模的市场,限制了基础设施提供商、互联网服务商、内容提供商、电子商务等商业领域的扩展。因而,消除数字鸿沟就是解放这些市场,解放生产力,就可以创造发展机遇,缩小国家或地区间的发展差距。这种观点还认为,近年来,虽然发达国家的某些数字鸿沟(如男女之间)正在缩小甚至消失,但不同经济地位的差距、城乡差距以及全球差距却在拉大;一旦我们把测度指标从简单的“有”“无”延伸到其他指标(如宽带网的使用率、人均 ISP 数量等),这种趋势就更加明显。由于“数字鸿沟”具有加剧的趋势,因而它不可能在市场作用下自然消失^[85-90]。

第三种观点(本文称之为数字鸿沟问题上的左派观点)同样认为数字鸿沟是当代社会的客观现实,但它反对把数字鸿沟单纯解读为经济发展问题,认为它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是利益集团“为了获得对信息资源的控制以及与此相伴的社会权势而进行的斗争的一部分”^[91];数字鸿沟的根本后果不在于它锁住了一部分市场,而在于它限制了一部分人的教育机会、就业机会、民主参与机会,即限制了一部分人的基